

# 傳統書院建築與《易經》文化

劉振維\*

## 【摘要】

傳統書院是儒家傳遞文化訊息的處所。過去研究，多集中於書院的歷史發展、學脈傳承、聖賢人物等，對書院建築及空間的蘊義少有研析。傳統書院整體建築以一中軸貫串，講堂、祠堂、書樓等位於此中軸之上，齋舍對稱立於兩旁，形成一個極具人文特色的書院建築群，同時具備祭祀、講學與居住等功用，呈顯了十分特殊的建築空間而獨樹一格。就其整體空間觀之，其表現了部分的《易經》文化，如方位的選擇（風水觀）、「大中至正」的精神，以及「天人合一」觀點等。本文欲對傳統書院建築中涉及《易經》文化提出一個解釋。全文區分兩部分，一闡釋傳統書院的空間意義，二論述書院建築空間中具《易經》文化的蘊涵。期能為書院建築與《易經》文化之關聯盡一份心力。

**關鍵詞：**書院、建築、空間、《易經》、文化

---

\*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服務學習組組長

## 一、前言

傳統書院是儒家傳遞文化訊息處所，透過與科學考試的聯結，成為過去士君子寒窗苦讀的最佳場域。過去研究傳統書院文化，多集中於歷史發展、學脈傳承、聖賢人物等，對於書院建築及空間的蘊義少有研析。<sup>1</sup> 隨著新式教育的傳入，以及科學考試的廢除，致使一個世代隕落並鬱鬱而終，傳統書院的價值自然容易隨之而被忽略並冷落。但傳統書院因同時具備祭祀、講學與居住空間等功用，與各縣孔廟或傳統民居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呈顯特殊的建築群落而獨樹一格。吾人對於清代臺灣書院的文化蘊義研析不算陌生<sup>2</sup>，雖然對建築本身

<sup>1</sup> 據筆者所知，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臺灣書院實例之研究》（臺北：故鄉出版社，1996）是首開此研究論題。楊慎初《中國書院文化與建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是最近對書院做整體的探索。碩士論文中，簡聰敏《清代書院建築配置與單元空間佈局類型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2004）是對書院建築做較為整體的論述，餘皆為單一地方或單一書院之研究。如楊慎初編，《嶽麓書院建築與文化》（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簡榮聰，《藍田書院建築裝飾藝術》（南投：南投藍田書院管理委員會，2009）。在臺閩地區首開書院修復計畫以漢寶德《文開書院、文祠、武廟之研究與修復》（臺北：境與象，1983）最早，依序有閻亞寧編《員林興賢書院之研究與修護計劃》（臺北：漢光建築師事務所，1990）、李重耀《臺閩地區第三級古蹟臺北市學海書院（現高氏宗祠）研究與修護計劃》（臺北：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992）、漢光建築師事務所《南投藍田書院之研究與修護計劃》（南投：南投縣文化局，1993）、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屏東縣第三級古蹟「屏東書院」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屏東：屏東縣政府，2002）、曾文吉《彰化縣第三級古蹟興賢書院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6）、符宏仁建築師事務所《彰化縣第二級古蹟和美道東書院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暨施工紀錄》（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6）與《南投縣第三級古蹟登瀛書院彩繪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暨施工紀錄》（南投：南投縣文化局，2007）、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高雄縣第三級古蹟鳳儀書院解體調查紀錄工作報告書》（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8）等。學位研究則有洪志遠《形狀文法的意義描述系統初探——以臺灣傳統書院建築為例》（臺中：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與郭承儀《臺灣傳統書院建築構造類型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兩篇，皆以臺灣書院作為研究對象。單篇論文以大陸地區近來研析甚多。不過，整體而論，對書院建築及空間的蘊義之研析仍有探究空間。

<sup>2</sup> 筆者自2002年發表〈略論乙未遺民洪棄生的民族精神——以《寄鶴齋詩話》為例〉（刊《南台科技大學學報》，2002年12月，27期，頁193-211）一文開始關注臺灣儒學發展，故研析清代臺灣書院的文化蘊義，計有〈宜蘭仰山書院之始末及其基本精神〉（刊《漢學研究》，2004年06月，22卷1期（總號44號），頁253-280）、〈彰化鹿港文開書院儒學精神之研究〉（刊《朝陽人文社會學刊》，2005年12月，3卷2期，頁53-102）、〈論臺北艋舺學海書院的儒學精神〉（刊《朝陽人文社會學刊》，2007年12月，5卷2期，頁59-93）、〈臺南海東書院創建之始末及其基本精神〉（刊《朝陽人文社會學刊》，2008年06月，6卷1期，頁279-322）、〈論清代臺灣書院學規的精神及其對現代教育的啟示〉（刊《哲學與文化》，2008年09月，35卷9期（總號412期），頁107-127）、〈彰化白沙書院之始末及其基本精神〉（刊《止善》，2009年06月，6期，頁89-110）、〈澎湖文石書院的始末及其基本精神〉（刊《止善》，2009年12月，7期，頁71-98）等7篇有關於臺灣書院精神的學術論文。

的規劃、形制、構件、材料以及工法之運用等不甚理解，但傳統書院及建築群落所承載的除了功名利祿之階的世俗名利之外，實亦扛荷著文化的深層運脈與精神，遂使中華文化不絕如屢，得以代代相承；《易經》文化亦在其內。

《易經》，被儒家尊為「群經之首」<sup>3</sup>，魏晉道家視為「三玄」之一<sup>4</sup>，是中

國歷史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其範圍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探究「宇宙之實然」與「人事之應然」及其關係。《繫辭傳》曾說：「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上）強調「易」理與天地齊等，所以能「彌綸」（普遍包絡）天地之道<sup>5</sup>；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故能理解「幽明」（有形無形）之緣故<sup>6</sup>；考察萬物之始得知其所以存在（生），返求為萬物終結故知其所以消亡（死）。<sup>7</sup> 此是指「宇宙之實然」。《繫辭傳》又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下）聖人伏羲氏自仰觀俯察後作八卦，以至重為六十四卦，衍生出「人事之應然」，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乾卦）、「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卦）；於此不難看出《易經》討論宇宙與人事二者之間的關聯。是以《繫辭傳》言：「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下）<sup>8</sup> 範圍廣大而完備，包含天地人三才之道。「易」理以「陰

<sup>3</sup> 見《漢書·藝文志》。班固(32-92)等撰，《漢書》，卷 30〈藝文志〉，頁 1723；收於《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第 2 冊。

<sup>4</sup> 魏晉時期，人們對先秦典籍《老子》、《莊子》、《周易》三部書總稱為「三玄」。「三玄」一辭，始見於北齊顏之推(529-595)的《顏氏家訓·勉學》：「何晏、王弼，祖述元（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泊於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元（玄）』。」「茲風」，乃指玄學清談之風。見顏之推，《顏氏家訓》，頁 15-16；收於三〇年代上海世界書局出版之《諸子集成》（上海：上海書店，1986），第 8 冊。

<sup>5</sup> 孔穎達(574-648)《正義》言：「彌，謂彌縫補合。綸，謂經綸牽引。能補合牽引天地之道，用此易道也。」見《周易正義》（臺北：藍燈文化公司，1993／《十三經注疏》，重刊宋本周易注疏附校勘記），易七，頁九右。高亨(1900-1986)注：「《釋文》引京云：『準，等也。彌，遍也。』《集解》引虞翻曰：『綸，絡也。』彌綸即普遍包絡。此二句言《易經》所講之道與天地齊，普遍包絡顛地之道。」見《周易大傳今注》（濟南：齊魯書社，2009），頁 457。周振甫(1911-2000)，《周易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233。

<sup>6</sup> 韓康伯注：「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周易正義》，易七，頁九右。

<sup>7</sup> 韓康伯注：「死生者，終始之數也。」《周易正義》，易七，頁九右。「原」指「察」，見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頁 458。

<sup>8</sup> 《說卦傳》亦言：「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陽」解釋之，「繼善成性」，此所具原理普遍為世人在日常生活中應用，只是百姓對之無所理解而不自知。<sup>9</sup> 如是理解或有他說，然正是因其可詮釋空間甚大，是以引述至中華文化中各個領域，深深影響著二千年來中國人的認知；因此，可以說《易經》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之一。《易經》呈顯的文化蘊義，自然包括傳統書院建築在內。

本文透過傳統書院建築與《易經》文化的對比，欲彰顯傳統書院建築中含具的《易經》內涵。全文區分兩部分，一闡釋傳統書院的空間意義，二論述書院建築空間中具《易經》文化的蘊涵。最後作一結論。

## 二、傳統書院的空間意義

書院起於唐代<sup>10</sup>，歷經五代<sup>11</sup>、宋、元、明、清的一種獨特的教育機構，時經千載。整個中國先後曾出現過 7,000 餘所書院<sup>12</sup>，是私人或官府所設的聚徒講授、研究學問之場所，並成為傳統讀書人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書院集人才培養、學術創新、文化傳播等功能於一體，以私人辦學為主，教學活動與學術研究結合，是傳統中國社會自唐宋之後文化、思想、教育與學術的中心。書院的普遍興起，成為較完整的教育制度是在宋代及其以後。北宋初年，無力興學，遂擴大科舉名額，並通過賜書、賜額、賜田、召見山長等方式扶持

<sup>9</sup>《繫辭傳》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上）

<sup>10</sup>《新唐書》：「開元五年，乾元殿寫四部書，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四人，以一人判事；押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奏，領中官監守院門；知書官八人，分掌四庫書。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脩書院，置使及檢校官，改脩書官為麗正殿直學士。八年，加文學直，又加脩撰、校理、刊正、校勘官。十一年，置麗正院脩書學士；光順門外，亦置書院。十二年，東都明福門外亦置麗正書院。十三年，改麗正脩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玄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此因唐代雕版印刷成熟，書籍數量激增，故於開元年間設有麗正書院（集賢殿書院）為皇室修書，始有書院之名。其任務為輯刊古今典籍、收藏圖書、備為皇帝顧問、承旨撰文以及經筵講學等，功能不同於後世書院。見歐陽修(1007-1072)、宋祁(998-1061)撰，《新唐書》，卷 47「中書省·集賢殿書院」，頁 1212-1213；收於《二十四史》，第 11-12 冊。

<sup>11</sup>唐安史之亂以後，戰爭頻繁，官學衰廢，歐陽修於《新五代史》中言：「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見卷 34〈一行傳〉，頁 369；收於《二十四史》，第 13 冊。某些篤學之士仿效佛教禪林做法，選擇山林名勝之地建屋立舍，藏書授書，讀書治學，聚徒講學，是時始有書院之實。考北宋四大書院源流，多與唐末私人隱居讀書相關。參丁鋼、劉琪著，《書院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頁 15-19。

<sup>12</sup>楊慎初，《中國書院文化與建築》，頁 120。

書院，使之替代官學不足，以為國家培養人才，故書院逐漸嬗變為私辦官助、半官辦或完全官辦的學校。<sup>13</sup> 南宋，學者如朱熹(1130-1200)、張栻(1133-1180)、呂祖謙(1137-1181)、陸九淵(1139-1193)等，在各大書院講學或修復書院，促使學術繁榮昌盛，完成學術與書院的一體化，並首開書院會講先河，對天下書院影響甚大。<sup>14</sup> 南宋時期的書院可謂是古代文化的代表，後人亦有「南宋四大書院」一說。<sup>15</sup> 南宋後期，書院受到中央政府控制；元朝繼承如是政策，將書院列入全國官辦學校系統，生機盡失。<sup>16</sup> 明初，規定非官學生員不能參與科舉，於是書院不興長達百餘年。<sup>17</sup> 至明中期，因科舉之弊孔熾，官學

<sup>13</sup> 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賜額太室書院(即嵩陽書院)，賜《九經》，書院即刻印供應學者；仁宗景祐二年(1035)敕令西京(洛陽)官員重修書院，賜額更名「嵩陽」。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邑人曹誠願以學舍 150 餘間、藏書 1,500 卷入官，並請戚同文(904-976)之孫戚舜賓主院，真宗「面其可奏」，賜額「應天府書院」，命曹誠為助教，太常博士王瀆掌教事；成為官學書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真宗親自召見山長周式，拜國子監主簿，賜「嶽麓書院」額，書院之名始聞於天下。景佑二年，知州奏請仁宗賜田學及「石鼓書院」額。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賜國子監印本《九經》於白鹿洞書院。此皆因書院教學有功，為國育才獲得御賜而揚名。諸此等等。參季嘯風主編，《中國書院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嵩陽書院」、「應天府書院」、「嶽麓書院」、「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等條目，頁 168、157、207、194、111。

<sup>14</sup> 朱熹從政近十年，每到一處即興辦書院教育，並親自講學，如嚴州瀛山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與張栻會講嶽麓書院，修復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興建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滄州精舍等，重拾自由講學傳統。張栻創城南書院，主持嶽麓書院，並於寧鄉道山、衡山南軒、湘潭碧泉等書院聚徒講學。呂祖謙曾創麗澤書院，常邀他派學者至書院講學。南宋淳熙二年(1175)，由呂祖謙邀請，朱熹與陸九淵兄弟等人於信州鉛山鵝湖寺參加，名為「鵝湖之會」學術會議，首開書院會講之先河。陸九淵曾於白鹿洞書院講學，立象山精舍，四方之徒大集。參《中國書院辭典》「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條，頁 393-394、445、391-392、453-454。

<sup>15</sup> 盛朗西(1901-1974)說：「北宋諸儒，多講學於私家。南宋諸儒，多講學於書院。故南宋時，書院最盛。」見《中國書院制度》(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頁 27。全祖望(1705-1755)有「南宋四大書院」一說，指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麗澤書院與象山書院。見《鮚埼亭集外編》，卷 45〈答張石癡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1722-1723。分別代表湖湘學、閩學、婺學及象山學等理學學派的活動基地，見楊慎初，《中國書院文化與建築》，頁 9。

<sup>16</sup> 《元史》至元二十八年(1291)：「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為書院。」規定「書院設山長一員」。山長皆由官授，有俸祿，與其他學官一樣「受行省及宣慰司割付」。「自京學及州縣學以及書院，凡生徒之肄業於是者，守令舉薦之，臺憲考覈之，或用為教官，或取為吏屬，往往人材輩出矣。」見宋濂(1310-1381)等撰，《元史》，卷 81「學校」，頁 2031-2032；收於《二十四史》，第 18 冊。元代書院被納入官學軌範，表面看似繁榮，實質弊端暴露，自由講學生命力消失殆盡，教授者敷衍塞責，學者追求功名利祿，學術空氣淡薄。

<sup>17</sup> 洪武元年(1368)令「改天下山長為訓導，書院田皆入官」；五年(1372)，朱元璋再令「革罷訓導，弟子員歸於邑學，書院因以不治，而祀亦廢」。見雍正年間之《寧波府志》卷九。轉引自鄧洪波，《中國書院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頁 274。

漸趨衰落，王陽明(1472-1529)、湛若水(1466-1560)等士大夫復倡講學，書院因之興起，自由講學風氣盛行，於是不同學派都將書院作為傳播自身學說的重要途徑，自然願意建立書院並訂立規條；書院至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時達到高峰，致使朝廷感到不安而遭到禁制，出現四次禁毀書院事件。<sup>18</sup> 清初，順治下令「不許別創書院」<sup>19</sup>，康熙則以頒額、賜書予書院引導方向發展。<sup>20</sup> 至雍正十一年(1733)方詔令各省創建書院<sup>21</sup>，此後各府、州、縣競相建立，作為準備科舉應試場所，以補學校之不足。乾隆年間，將書院明確定於官辦教育體制，履次下詔規範書院管理、聘任院長、選擇生徒、課業考核、獎懲辦法，皆有明文規定<sup>22</sup>，最終絕大部分皆成為科舉考試的預備機構。清代書院建制規模則發展到歷史上的最高峰，總計「有書院 4,365 所，其數是唐、五代、遼、宋、金、元、明各朝書院總和的 1.49 倍」，成為遍布寰宇的普及之勢。<sup>23</sup> 然因書院與科舉考試更形密切，官學化問題更為突出，於是書院弊病叢生，盛朗西即言：「語其通病，約有數端：一曰山長充數，不論品學也；一曰士風浮夸，動滋事端也；一曰多課帖括，無裨實用也；一曰注意膏獎，志趣卑陋也。」<sup>24</sup> 清廷雖一再通諭告誡，無奈積重難返，形同具文。隨著清末外患瀕仍，亦仿效西法為

<sup>18</sup> 《明史》於顧憲成(1550-1612)等列傳後贊言：「成、弘以上，學術醇而士習正，其時講學未盛也。正、嘉之際，王守仁聚徒於軍旅之中，徐階講學於端揆之日，流風所被，傾動朝野。於是搢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而名高遠播，氣盛招尤，物議橫生，黨禍繼作，乃至眾射之的，咸指東林。甘陵之部，洛、蜀之爭，不烈於是矣。……」見張廷玉(1672-1755)等撰，《明史》，卷 231「列傳第一百十九」，頁 6053；收於《二十四史》，第 19-20 冊。四次禁毀書院事件，一為嘉靖十六年(1537)七月，御史游居敬(1509-1571)上疏斥責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私創書院，「倡其邪說」，請毀之；詔從其言。次年五月，吏部尚書許讚(1473-1548)以「近來撫按兩司及知府等地方官，多將朝廷學校廢壞不修，另起書院，動費萬金，徵取各屬師儒赴院會講，初發一邑制裝，及舍供億，科擾尤甚……宜盡查算。如仍有建立者，許撫按據奏參劾。」旨準。萬曆二年(1574)內閣首輔張居正(1525-1582)上〈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要求重視官學，制止「別創書院」，聚徒講學，如有違者，「許各撫按衙門訪拿解發」。七年(1579)春正月，「詔毀天下書院，自應天府以下，凡六十四處，盡改公廨」，致「講學受禍者不啻千計」。天啓五年(1625)七月，魏忠賢(1568-1627)「毀首善書院」，八月「毀天下東林講學書院」。參《中國書院辭典》「明季毀書院事件」條，頁 707。

<sup>19</sup> 順治九年(1652)詔：「各提學官督帥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游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見《古今圖書集成·選舉志·學校部》，卷 73。轉引自鄧洪波，《中國書院史》，頁 430。

<sup>20</sup> 參鄧洪波，《中國書院史》，頁 431-434。

<sup>21</sup> 見《清朝文獻通考》，卷 70。見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頁 854-855。

<sup>22</sup> 參鄧洪波，《中國書院史》，頁 431-434。

<sup>23</sup>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頁 404。

<sup>24</sup> 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頁 217。

之，然實質並未改變。光緒二十七年(1901)八月，詔令各省所有書院改爲西學學堂；接續的清末新政，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完全廢除科舉與書院，建立新學堂，引進並施行西式教育制度。<sup>25</sup> 延續千年之久的傳統書院制度之教育模式於此告終。但傳統書院作爲文化思想與教育學術的標誌，曾是天下士子講經論道、辯學揚理之所，文人學士心所嚮往之地，其遺韻流風仍是值得後輩欣喜與感懷。是以欲明瞭傳統文化的精神與傳衍，對傳統書院實有瞭解之必要。

傳統書院是一種獨特的學校制度與教育場所，集講學、教育、學術、祭祀、藏書、藏修、遊息、生活等功能爲一體的文化機構。遠自宋代，書院即形成講學、藏書、祭祀與學田四大基本規制。講學、藏書與祭祀三者，成爲書院的三大事業<sup>26</sup>，歷來皆甚爲重視，是最能反映作爲傳統文化教育組織的特色。學田之設是爲保證解決三大事業的經費問題，是傳統書院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由於書院早期體制與仿自佛教禪林制度，故書院建築對擇地十分講究，一般皆在名山大川之麓。<sup>27</sup> 如宋代著名書院大都接近山水，人跡罕至、茂林修竹相隨，以便在如是空間中修身養性、陶冶性情與砥礪德行；嶽麓書院在嶽麓山下，嵩陽書院坐落北嵩山南麓，白鹿洞書院座落於廬山五老峰東南麓。<sup>28</sup> 下圖爲白鹿洞書院圖：

---

<sup>25</sup> 參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頁 235-236。

<sup>26</sup> 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頁 47。

<sup>27</sup> 參楊布生、彭定國編著，《中國書院與傳統文化》（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第四章「中國書院與三教合流」，頁 120-152。朱熹〈衡州石鼓書院記〉即言：「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群居講習之所。」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9，頁 3783；收於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 20-26 冊。

<sup>28</sup> 見《中國書院辭典》，「嶽麓書院」、「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等條目，頁 207、168、110-111。



(原載清康熙五十九年《江西志》)

清代之後，隨著經濟發展，書院多位於城外或城區邊緣，以保相對安寧與讀書講學環境。<sup>29</sup> 如臺灣臺南的南湖書院，知府蔣允焄因崇文書院「雜闐闐中，市井囂塵與弦誦之聲相間發，甚非所以一耳目而肅心志也」，故「既抵任後二年，得南湖數畝，諸山迴抱，林木參差，有巖足陟、有川足泳、有緇廬寶刹足遊憩、有崇臺阿閣足登覽、有佳木繁花足挹翫」，是以在南湖「爰捐廉俸，廓而新之；而吳誠、許居、王賞實踴躍趨事。傍湖構學舍數座，別建講堂於法華寺左畔，隨方位置，不綴續也」；乃取「孫復之於泰山、李渤之於嵩麓，皆以境地超曠，展發才思，成就後學，效至遠也」之意。<sup>30</sup> 是可見書院擇地講就讀書講學之環境，乃在於「一耳目而肅心志」。書院建築強調擇地，強調靜謐與樸質，以保障身心環境之清靜，實亦與孔子(551-479 B.C.)所言的「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之意相合，也就是說，良善環境能提供人得以涵養良善的氣質。依論者所言，此亦是「對地理的尊重」。<sup>31</sup>

就書院建築配置言，其座落方向主要是坐北朝南，亦有其他方位，唯無朝北者；門位一半居中，一半重視東南位，單門或雙門無一定，部分有照牆。<sup>3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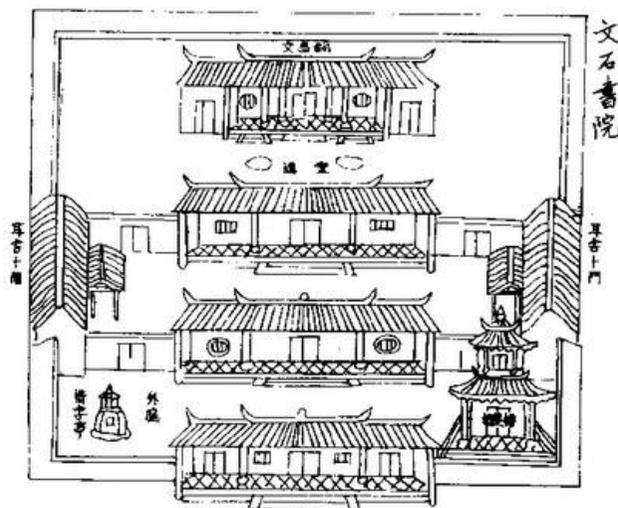
<sup>29</sup> 參丁綱、劉琪著，《書院與中國文化》，頁 188；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臺灣書院實例之研究》，頁 41-42。

<sup>30</sup> 見蔣允焄〈新建南湖書院碑記〉一文；收於謝金鑾(1757-1820)、鄭兼才(1758-1822)纂修，《續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卷七 藝文(二)，頁 504-505。

<sup>31</sup> 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臺灣書院實例之研究》，頁 42。

<sup>32</sup> 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臺灣書院實例之研究》，頁 44-45。

傳統書院整體格局多是閉合式的中井庭院空間，與外界隔絕。<sup>33</sup> 其建築群與三大事業息息相關，大致對應為講堂齋舍、書樓書庫、祠堂廟宇，形成不同的空間區域，因此在建築上必然包含講堂、祠堂、書樓、齋舍等物體，形成一個極具人文特色的書院建築群。一般來說，此建築群基本上是以一中軸縱貫，講堂、祠堂、書樓位於中軸之上，齋舍等其餘建築對稱分立兩旁。<sup>34</sup> 部分因為地形起伏而有所變異。臺灣澎湖文石書院平面圖，即是標準的中軸縱貫書院，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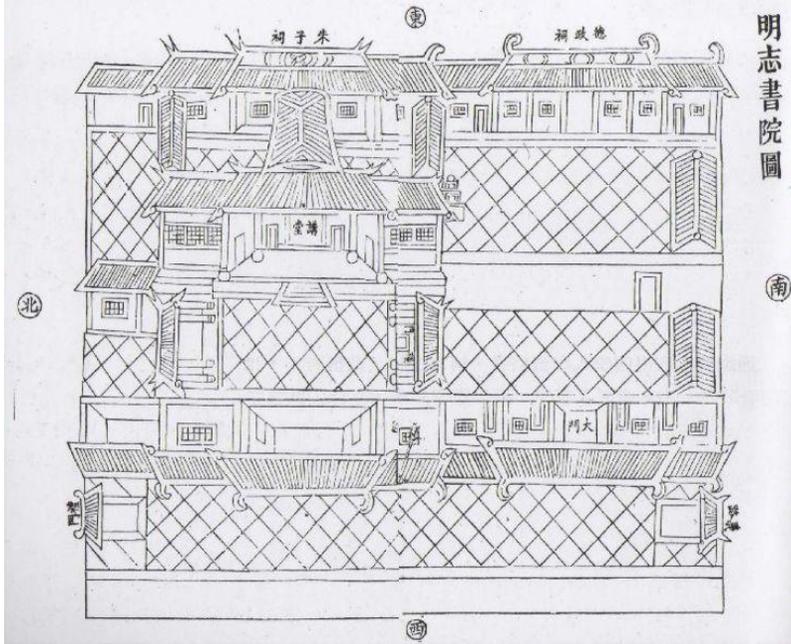
(原載清光緒十九年《澎湖廳志》)

同時，每一個建築的所在位置、裝飾以至總體格局，均遵循傳統的綱常禮教，使書院師生置身於濃厚的倫常氛圍與嚴謹秩序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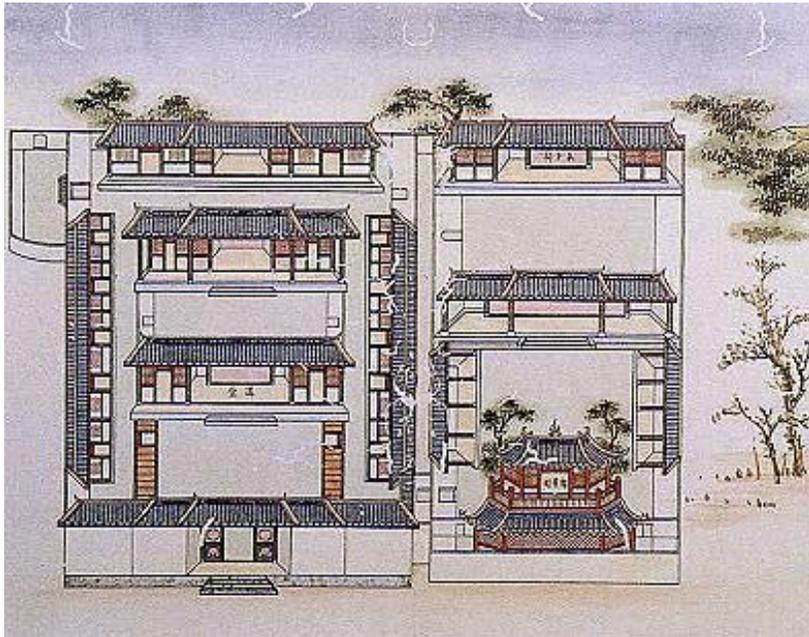
以清代臺灣書院為例，整體格局多為三進建築（如下圖明志書院圖），僅臺南崇文書院（如下頁圖）、文石書院為四進（如上圖）。三進建築第一進為門廳（前座），有時建有門樓牌坊、東西閣；第二進為講堂（中座），多為三間，大為五間。

<sup>33</sup> 楊慎初，《中國書院文化與建築》，頁 76。

<sup>34</sup> 楊慎初，《中國書院文化與建築》，頁 81。



(原載清同治十年《淡水廳志》)



(臺南崇文書院：原載清乾隆四十三年臺灣知府蔣元樞的〈重修台郡崇文書院魁星閣圖說〉)

有些書院偶有以中座或其樓上為文昌閣、魁星樓者，則講堂或設後座。第三進為祠堂（如明志書院朱子祠）及書樓（後座）（書樓多設計為魁星樓、文昌閣、尊經閣等），少數作為寢室。東西兩側廂房或學齋多設於建築後段，只有生童

人數多時才全部作為學齋。通常第二進至第三進的空間，常設亭臺、水池或花園等造景（參表一所示）。<sup>35</sup> 而大的書院還有園林造景（如嶽麓書院）。因此，傳統書院建築群在空間上的分佈上，故其建築格局自然包含了精神、教學與居住等空間，相對所指的即是祠堂、講堂與齋舍等其他建築。<sup>36</sup>

精神空間主要呈顯書院的祭祀，彰顯神聖的蘊義。早期書院是紀念前賢的祠堂或家祠，所紀念者若具學術地位，便讓人很容易產生設置書院的聯想。大體言之，書院祭祀對象有二：(1)祀先哲名儒，較大規模書院有祭祀至聖先師孔子，除此之外，一般供奉是該書院尊崇的學術流派宗師、先賢、學者，部分祭祀有功於書院建設的地方官紳等。如理學取得正統，書院即普遍祭祀「北宋五子」及朱子。以臺灣書院為例：「今學宮奉孔子為先聖，從祀者皆先師。書院多祀先師，而不敢祀先聖。閩中大儒以朱子為最，故書院無不崇奉，海外亦然。」<sup>37</sup> 臺灣書院多祭祀朱子或北宋五子，想當然耳自是理學一脈<sup>38</sup>；此即所謂「正學統」。清代經學書院則專祀漢儒，如許慎（約 58- 約 147）、鄭玄（127-200）等，顯示學術思想的不同。<sup>39</sup> 祭祀地方官紳者，如臺灣彰化興賢書院祭祀首位講學的邱海先生。<sup>40</sup> (2)祀道教奉祀「五文昌帝君」：「文昌帝君」（梓潼帝君）、「魁星星君」（大魁星君）、「朱衣神君」、「純陽帝君」（呂洞賓）、「文衡帝君」（關聖帝君）。此為中國神話中主掌功名、祿位與文章之神，科舉考試生員因心理模拜與慰藉為祈求功名利祿，故而崇祀盛行。<sup>41</sup> 另有祭祀文字發明者倉頡先師，書院中多位於前院的惜字亭（惜字爐），即取崇文敬字之意，專為焚燬字紙而設<sup>42</sup>；有些書院也崇祀名宦（如韓愈(768-824)）、鄉賢者，實皆具濃厚的教化蘊義。又祭祀空間專祠通常位於書院建築中軸的最後（即於

<sup>35</sup> 參劉伯驥(1908-1983)，《廣東書院制度》（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58），頁 87。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臺灣書院實例之研究》，頁 35。

<sup>36</sup> 王鎮華區分精神、教學、居住、行政、藏書、服務、交通等七類，見《書院教育與建築——臺灣書院實例之研究》，頁 44-46。

<sup>37</sup> 鄧傳安，〈新建鹿港文開書院記〉；收於氏著，《蠡測彙鈔》（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 41-42。

<sup>38</sup> 參拙著，〈由臺南朱文公祠二碑記論清代臺灣的教育方向〉以及〈論清代臺灣朱子學〉二文。前文收於《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 159-178。後文收於蔡方鹿主編，《書院與理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2），頁 275-290。

<sup>39</sup> 楊慎初，《中國書院文化與建築》，頁 67。

<sup>40</sup> 《中國書院辭典》，「惜字爐」條，頁 726。張瑞和，《維繫傳統文化命脈——員林興賢書院與吟社》（臺中：晨星出版公司，2009），頁 55。

<sup>41</sup> 參陳昭瑛〈臺灣的文昌帝君信仰與儒家道統意識〉乙文；收於《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臺北：正中書局，2000），頁 81-130。

<sup>42</sup> 《中國書院辭典》，「興賢書院」條，頁 352。

講堂之後)，以呈顯其崇高與莊嚴，顯示先聖先師的尊貴地位，亦在表達溯源與不忘本之文化作用。然規模較大之書院專祠不僅一座，如嶽麓書院有「濂溪祠」、「四箴祠」（祀二程子）、「崇道祠」（祀朱熹、張栻）、「六君子堂」（祀朱洞、李允則(953-1026)、周式、劉珙(1120-1176)、陳鋼、楊茂元(1450-1516)）、「船山祠」等，位置是東西向而不在中軸，「目的是藉紀念先賢以教化後輩」。<sup>43</sup> 此外，書院整體建築即是精神空間的呈顯，如大門、堂前楹廊側牆、過門、柱子等，皆有門額、字畫、楹聯等裝飾，充分展現精神空間以提醒士子精進學習與成聖成賢。以臺灣彰化和美道東書院為例，正殿祀堂神龕旁有一對聯：「集解析疑傳斯文正印，繼往開來為萬世宗師」，中掛「會聖之精」與「梯航絕學」匾額，為晉江進士莊俊元(1808-1879)墨跡。「會聖之精」喻指士人至此可與朱熹聖靈相會；「梯航絕學」意指儒家道統至朱熹興復，具為往聖繼絕學之功，使聖學能如階梯般次第學習。正殿外兩柱楹聯為「六經註腳秦漢以來獨步，千聖傳心孔孟而後一人」；正殿左右各一圓形拱門，左刻「至教遺千載，微言播六經」，右刻「詩書資博約，禮樂致中和」。諸此皆與整體書院的教學配合無縫，以時時提醒學子進德修業。

傳統書院講堂是主要的教學空間，目的在「遵道」，但齋舍、庭院等都具涵化教學的性質。<sup>44</sup> 講堂位於書院中軸線上，一般而言是書院的中心，齋舍列於兩旁，書樓、祭祀專祠亦圍繞此而予以安排。講堂建築雖是書院建築群的中心，但在建築形式上並不顯得特別高大，此不同於宮廟、寺祠的主殿呈顯出雄偉氣勢，原因在於其具講學、教育、學術（會講、講會）、文會、藏修、遊息、生活等功能。為因應講學的需要，講堂多為寬闊的橫向形式，前面必有一較大庭院，講堂前面對前庭是完全敞開的，以靈活運用室外空間，如是可容納更多聽講者（因講說是完全向社會開放的）；前庭無論採取何樣方式，目的都是為使講堂空間得以無限擴大延伸。陸九淵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創象山書院，時稱「象山精舍」，並講學其中，據載：「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簞至，會揖，陞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齋肅無譁。」<sup>45</sup> 又王陽明於嘉

<sup>43</sup> 楊布生、彭定國編著，《中國書院與傳統文化》，頁 161、165-166。嶽麓書院至清光緒，前後相加計有 29 處專祠，受祀者將近百人，祠宇之眾，受祀之多，前所未有。見朱漢民，《嶽麓書院的歷史傳統》（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96），頁 46。

<sup>44</sup> 據清光緒《武昌縣志》卷 7 元許善勝〈馬侯修學記〉：「學之有講堂，遵道也。」民國《湖北通志》卷 59 清艾浚美〈鄖山書院記〉：「書院之設，所以講學而造道也……為之講堂，以隆其規制；為之學舍，以專其藏修。」見《中國書院辭典》，「講堂」條，頁 701。盛朗西言：「書院之學，亦不過聞道而已。」《中國書院制度》，頁 59。

<sup>45</sup> 《象山全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7），卷 36〈年譜〉，頁十七上。

靖三年(1524)開闢稽山書院講學，「聚八方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各地學者紛至還來，「宮刹卑礙，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sup>46</sup> 其弟子錢德洪(1496-1574)記載：「癸巳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剎，徒足所到，無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追記其姓字者。」<sup>47</sup> 由得容納「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人不下數十百」觀之，可見傳統書院講堂建築之特色。現存嶽麓書院之講堂可參（如下圖）。

又藏書為傳統書院的一代功能，「藏書以備學者看讀」。<sup>48</sup> 規模較大書院因人才集中，故資料相對集中，後又有皇帝賜書，並有刻書傳播，為了便於管理與保護書籍，故設有藏書樓置經史群籍；其建築多設於後堂樓上，稱「藏經閣」、「尊經樓」或「御書樓」等<sup>49</sup>；亦有設於廂房、中堂樓上者。然臺灣的書院，藏書空間位置並不明確。<sup>50</sup>



嶽麓書院講堂<sup>51</sup>

<sup>46</sup> 吳光、錢明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35〈年譜三〉，頁1290。

<sup>47</sup> 錢德洪，〈刻文錄敘說〉；收於《王陽明全集》，卷41〈序說、序跋〉，頁1576。

<sup>48</sup> 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頁47。

<sup>49</sup> 參楊布生、彭定國編著，《中國書院與傳統文化》，第二章「中國書院與藏書刻書」，頁47-79。嶽麓書院設有「御書樓」。見朱漢民，《嶽麓書院的歷史傳統》，頁45。

<sup>50</sup> 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臺灣書院實例之研究》，頁45。

<sup>51</sup> 引自百度百科，「嶽麓書院」條，<http://baike.baidu.com/view/7288.htm>。

至於傳統書院的其他空間，如齋舍為學生生活作息與自修處所，「讀書寢食，則皆立有時刻」<sup>52</sup>，有時亦予命名提醒敬德修業<sup>53</sup>；山長住後堂側室；另有廚房、倉庫、浴室、水井、廁所、門房等服務性質的空間建築。又齋舍及進與進之間設有捲棚頂的「過廊」（或稱「過廳」或「甬道」，如上圖明志書院的第二進至第三進），可以遮雨與避陽；但為避免遮擋正堂正面，多採左右兩廊的做法。諸此，皆是圍繞著中軸並採左右對稱而建築的。重點是如是空間使師生朝夕相處，無私地切磋學術，言教身教致使彼此情感融洽，此亦是傳統書院的一大文化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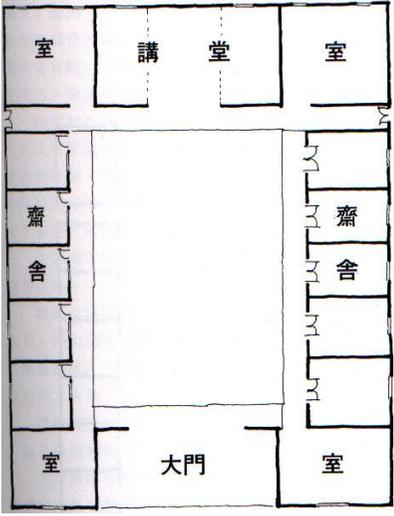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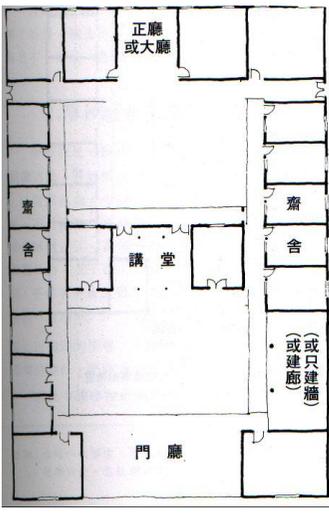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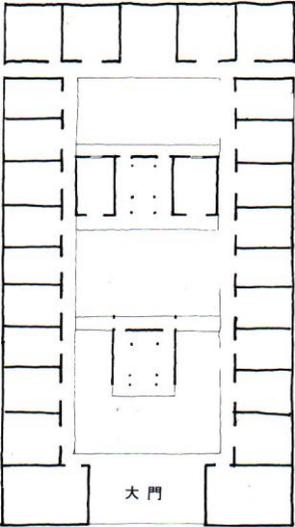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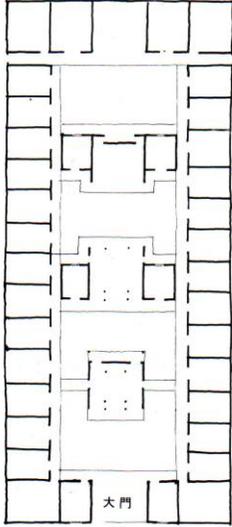
綜上所述，傳統書院建築的空間分布，實呈顯簡潔、素樸、敞開與環境教育等特點，這些是現代建築較不注意之處。簡潔在於建築空間分部明確，素樸在於其並無多餘裝飾，敞開呈顯於講堂與外在空間的結合。書院整體空間就具有涵化功能，除教師人師角色引導之外，透過祭祀的尊崇追遠，進而強調敬德修業；又充分與外在自然世界結合，講求景觀的庭院設計，提供息遊休憩之所，師生得以共同觀賞，隨感而發，探討學術，交換心得，整體環境即是一個形塑傳統謙謙君子的教育處所。<sup>54</sup> 傳統書院如是的建築空間分布，呈顯了世界獨一無二的人文特色，其與《易經》有何關聯？這是下節要探討的。

<sup>52</sup> 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頁 55。

<sup>53</sup> 如廣州番山書院，列有文、行、忠、信四齋；見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頁 85。此取《論語·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嶽麓書院初有存誠、主敬、居仁、由義、崇德、廣業六齋，於清代調為進德、正誼、明道、居業四齋。見朱漢民，《嶽麓書院的歷史傳統》，頁 43。

<sup>54</sup> 朱熹〈招舉人入白鹿咨目〉言：「山林闐寂，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卷 9；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頁 5002。

表一：書院建築格局

	
<p><b>二進式書院平面示意圖</b></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u>第一進</u>（前座）為儀門。</li> <li>2. 東西兩廂常為學齋，亦稱學舍、號舍、書舍。俗稱廊舍、蕪舍。門窗建常兩種開法。</li> <li>3. <u>第二進</u>（後座）為講堂。祭祀空間或附於講堂，或另設於別院。</li> <li>4. 前後兩室，常為廚房、浴室、儲藏、寢室等。廚房亦常設於跨院。</li> </ol>	<p><b>三進式書院平面示意圖</b></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u>第一進</u>（前座）為門廳。偶見門樓牌坊、東西閣。</li> <li>2. <u>第二進</u>（中座）為講堂。多為三間，大者五間。偶有以中座或其樓上為文昌閣、魁星樓者，則講堂或設後座。</li> <li>3. <u>第三進</u>（後座）多用為魁星樓、文昌閣、尊經閣、澄觀閣等。</li> <li>4. 廂房、學齋多設於後段，人多則全設學齋。</li> <li>5. 後院設亭、圃、池、園等。</li> </ol>
	
<p><b>四進式書院平面示意圖</b></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u>第一進</u>（前座）為大門。</li> </ol>	<p><b>五進式書院平面示意圖</b></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例子不多，用法不明確。</li> </ol>

2. 第二進（二座）講堂或大堂各半（五例）。	2. 二進有做爲二門者
3. 第三進（三座）爲大堂、客廳、正座之用或講堂之用各半（五例）。	3. 與四進式比較，大堂或增爲前後堂。
4. 第四進（後座）多用爲魁星樓、文昌閣、尊經閣、御書樓。	
5. 廂房爲齋舍。監院福德祠、先賢堂、書樓有置兩廂者，爲常在前院廂房。	

資料來源：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臺灣書院實例之研究》，頁 35-36。

### 三、傳統書院建築空間中具《易經》文化的蘊義

傳統書院建築或因地形、時代改變而有不同的具體呈顯，但建築空間大體如上所述，同時其結構是採用傳統建築手法。<sup>55</sup> 從傳統書院整體建築群所構成的空間觀之，其涉及了部分的《易經》文化，舉其大要如方位選擇、時中精神，以及「天人合一」觀等，茲分述如下。

#### （一）方位選擇觀

前文指出，傳統書院建築擇山林水秀之處而建，此與傳統民間信仰之「風水」有關。<sup>56</sup>「風水」，古稱「勘輿」。「勘輿」，本指天地之總名。<sup>57</sup> 將「風水」等同「勘輿」，即欲講求天道運行與地道變化的諧和，居於天地之間的人當如何選擇山川形勢以適應外在天象之變化。此理或恐來自《易經》。<sup>58</sup> 基本上，風水之說汲取《易經》思維，以整體思維作爲指導，觀察山川形勢是否爲「陰陽」對稱互補，「藏風聚氣」，目的在營造足以令人身心舒適、視野開闊與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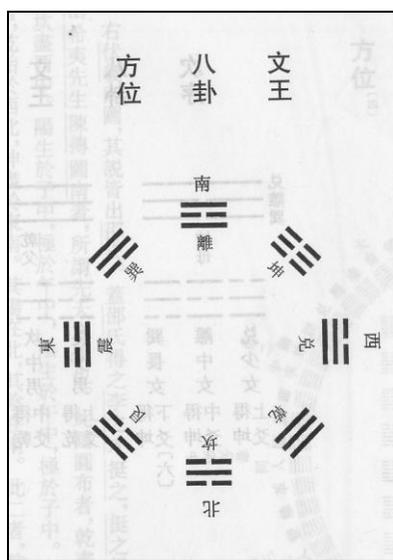
<sup>55</sup> 李劍平編著，《中國古建築名詞圖解辭典》（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書院」條，頁 358。

<sup>56</sup> 「風水」一辭，早見於晉郭璞(276-324)《葬書·內篇》：「葬者，乘生氣也。五氣（五行之氣）行乎地中，發而生乎萬物。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經曰：氣感而應，鬼福及人。蓋生者氣之聚；凝結者成骨，死而獨留，葬者反氣納骨，以蔭所生之法也。丘壟之骨，岡阜之支，氣之所隨。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風水之法，得水爲上，藏風次之。」以「氣」之聚散論之。收於清人張海鵬輯，《學津討原》（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第九集。但《四庫全書總目·葬書解題》：「考璞本傳，載璞從河東郭公受青囊中書九卷，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術。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爲火所焚，不言其嘗著葬書。唐志有葬書地脈經一卷、葬書五陰一卷，又不言爲璞所作。唯宋志載有璞葬書一卷，是其書自宋始出，其後方技之家，競相粉飾，遂有二十篇之多。……據宋志本名『葬書』，後來術家尊其說者改名『葬經』。」故將《葬書》作者視爲郭璞恐有疑義。見永瑤(1743-1790)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108，頁 921 上-中。

<sup>57</sup> 《漢書》，卷 87〈揚雄傳上〉：「屬堪輿以壁壘兮。」顏師古(581-645)引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頁 3523。

<sup>58</sup> 如陳碧，〈《周易》對中國「風水理論」的影響〉；刊《船山學刊》，2008年第3期（復總第69期），頁65-67。

盎然的最佳地理環境。因此在地點選擇時，以向陽、背山、面水，坐北朝南之座向最佳。如廣西義寧培元書院，「負陰抱陽」（背山面水）、「金帶環繞」（三面為水），此為最佳吉形（參下頁圖）。若環境無此良善，即以人工塑造之，如引水補基、挖塘蓄水（補水脈）、築壩造橋（固氣）、植樹造林（補龍背砂山）等。<sup>59</sup> 以臺灣〈新建南投藍田書院碑記〉為例，其言：「並卜地於街後東偏，西倚山麓，東面大屏，清流北護，蜀水南纏，大哮碧山遙相對峙，中開一局，形勝天成，而燄峰九十九尖蔚然在目。其東南三峰，遠插雲霄，出歿隱見，變幻無常，則八同關之玉山，可望不可即。洵海外一奇觀也。夫以山川之秀，氣運日開，其磅礴鬱積，知必有偉人杰士出乎其間，不僅為吾邑生色，誠邦家光也。地靈人傑之說，殆信然歟！」<sup>60</sup> 指藍田書院位居山水之間，秉承自然形勝靈氣，得以培育人才，出現偉人杰士。此將風水與士風文氣聯繫起來，甚至認為是有必然關係，作者閩清儒學教諭曾作霖亦是相信，故言「地靈人傑之說，殆信然歟」。傳統書院求其環境，除依風水之外，即在求其清靜，劉伯驥言：「凡稱風水好的地方，山環水繞，藏風聚氣，環境敞定很幽美的，所以雖然是為求風水而選擇地方，其實還暗合教育上優良環境的作用。」<sup>61</sup> 當時書院是很注重環境：求風水是心理上的幻想，而求清靜是實際所需要，古人所謂名山事業，就是指後者而言的。」<sup>61</sup>



<sup>59</sup> 丁鋼、劉琪著，《書院與中國文化》，頁 194。

<sup>60</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教育碑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 44。

<sup>61</sup> 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頁 102。

又傳統書院之座向多為坐北朝南者，此亦與風水觀點相關，因「居陽背陰，謂之大吉」。坐北朝南的方位稱為坎位；進出書院門戶的山門，亦多位於南向（離）、東南向（巽）或東向（震），此皆是吉位；位於東南方位的巽位，是為古代常用的入口角度。此據文王八卦方位圖說（如上圖）。<sup>64</sup> 文王八卦方位一說出自《說卦傳》。按「八卦」是人與外在世界自然共生中總結出的一套系統，用來說明事物現象和發展；其象源於以蓍草為筮具的筮卜方法，由陽爻(—)或陰爻(-)相互結合，每卦由陰陽爻三疊而成，共可排出八種不同卦象故稱。是以《說卦傳》言：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卦之觀念，即是陰陽相反相成的因素此消彼長的結果，對之，《繫辭傳》又說：「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上）闡明八卦的由來與運用。「太極」、「兩儀」（陰陽）、「四象」而「八卦」，似為一發生過程，實當為本體論述。即在宇宙本體為一極致（可說組成是「氣」），其由陰陽所構成，本身存在著四象（四方），其中即有「八卦」（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宇宙即由這八種物質構成，舉凡世界萬事萬物皆可由八卦象徵與概括。由之，後人將八卦分為先天與後天。

《說卦傳》說：「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後人據之畫出先天八卦圖（因傳說是伏羲創造，所以又稱伏羲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兌東南，艮西北。圖式中相對各卦卦象組成的陰陽爻恰好相反，表明八卦中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四對物體的對立統一<sup>65</sup>，同時反映陰陽爻由多變少的規律，以及八卦與太極圖的內在邏

<sup>62</sup> 引自楊布生、彭定國編著，《中國書院與傳統文化》，頁 178。

<sup>63</sup> 取自朱熹，《周易本義》，頁 22；收於《朱子全書》，第 1 冊。

<sup>64</sup> 丁鋼、劉琪著，《書院與中國文化》，頁 195；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臺灣書院實例之研究》，頁 42。

<sup>65</sup> 周振甫言：「它指出『天地定位』，天上地下的位子定了，這是對立。『山澤通氣』，這是統一。『雷風相薄』，這是矛盾。『水火不相射』，這是從水火的矛盾對立，轉到不相厭棄，即水火合起來可煮熟食品，即水火既濟，即統一。……這樣，就把卦辭的講吉凶

輯關係（如下圖）。先天八卦所反映的陰陽論，傳統中國建築自亦受其影響。

66



伏羲八卦<sup>67</sup>

《說卦傳》接著說：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詰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概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

此以八卦代表方所與季節。震東方，節令為正春；巽東南方，春末夏初；離南方，正夏；坤西南方，夏末秋初；兌西方，正秋；乾西北方，秋末冬初；坎北方，為正冬；艮東北方，冬末春初。由之以陰陽說明萬物生長季節變換的關係。宋人依之繪出後天八卦，據傳是周文王創造，故又稱文王八卦。後天八卦的圖式，是依節令

轉為義理，把吉凶跟義理聯繫起來了。」見《周易譯注》，頁 288-289。

<sup>66</sup> 程建軍，《中國建築與周易》（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頁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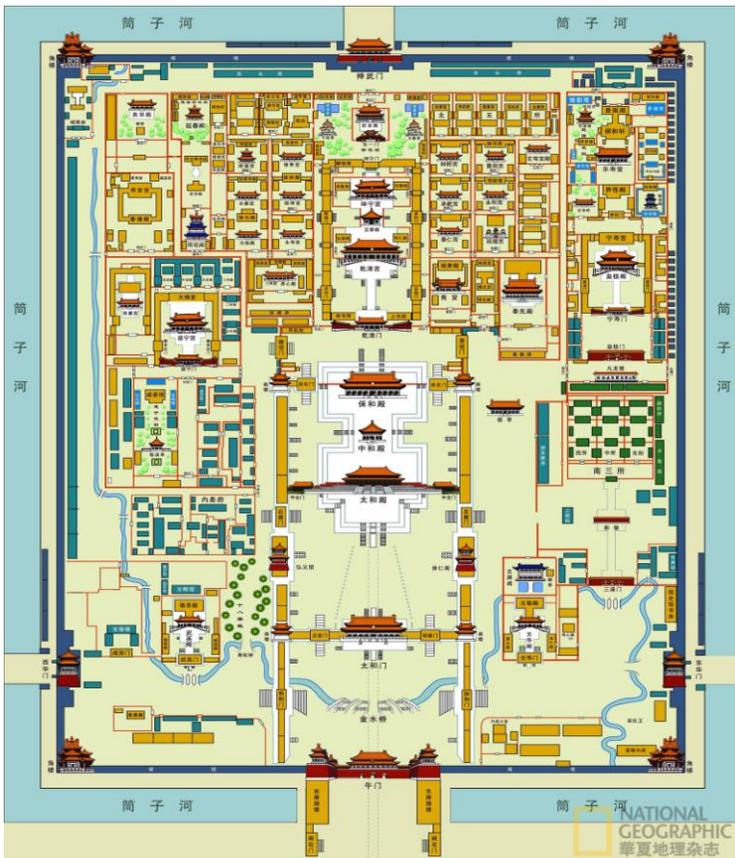
<sup>67</sup> 程建軍，《中國建築與周易》，頁 9。

## 傳統書院建築與《易經》文化／劉振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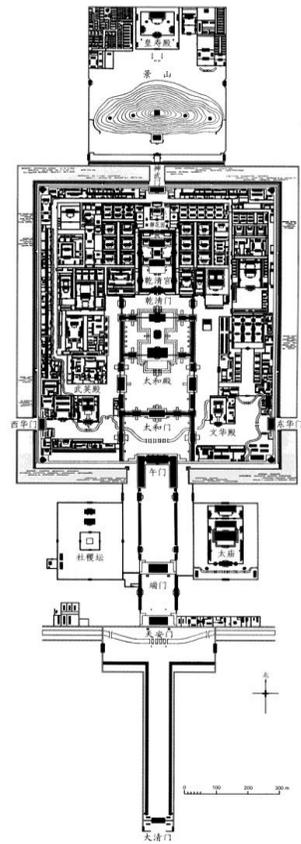
春夏秋冬與方位的東南西北順時針方向運行的，與後來的五行學說圖式相同，與月令圖式內容亦是一致。故其於建築呈顯上便講究「法天象地」的構圖。<sup>68</sup> 由是引發的風水說，如擇地於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山門位於巽位等等，即具「法天象地」的蘊義。

### （二）時中精神

書院建築以中軸對稱形式呈顯，此不獨見於書院，傳統建築皆以之為據，此以北京中軸線最具典型（如下圖）。主要建築沿軸線南北縱深發展，次要建築嚴格對稱地布置在中軸線兩側。<sup>69</sup> 中軸左右因陰陽觀，故具尊卑意識（如左尊右卑），於是呈顯了傳統「禮」的秩序與莊嚴，在空間氣勢上便展現出所謂的「正



《華夏人文地理》2003 年第 12 期



北京紫禁城總平面圖 <sup>70</sup>

<sup>68</sup> 程建軍，《中國建築與周易》，頁 42。

<sup>69</sup> 程建軍，《中國建築與周易》，頁 13。

<sup>70</sup> 中國百科網，「北京宮殿」條，

大氣氛」。<sup>71</sup> 此與《易經》文化頗為密切。論者言：「整本易經在每一卦中都充分流露出中華民族先民透過數千年人生經驗累積所體悟到的『人生的正大』。」「因此反應文化思想的中國建築，最根本的空間特性，即是『正大的氣氛』。」<sup>72</sup> 此即來自「中」的哲學，對之《易經》言「時中」。

《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意指透過自我省察，行事力求中和而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以求「致中和」之境。程頤(1033-1107)言：「不偏謂之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並以之為「孔門傳授心法」<sup>73</sup>，為儒家重要經典之一。同樣的，《易經》亦強調「中」，但其精神是「時中」；惠棟(1697-1758)於〈易尚時中說〉中說：

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時中。孔子作象傳，言時者二十卦，言中者三十 三卦；象傳言中者三十卦。其言時也，有所謂時者，時行者，時成者，時變者，時用者，時義者；前言中也，有所謂中者，正中者，大中者，中道者，中行者，行中者，剛中、柔中者。而蒙之象，則又合時中而命之。蓋時者，舉一卦所取之義而言之也；中者，舉一爻所適之位而言之也。時無定而位有定，故象言中不言時。然六位又謂之六虛，唯爻適變，則爻之中亦無定也。位之中者，惟二與五，漢儒謂之中和。……故象傳凡言中者，皆指二五。二尚柔中，五尚剛中，五柔二剛，亦得无咎。……愚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 編三絕，而為之傳，蓋深有味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時中之義，故于象象 二傳言之，重詞之複。子思作中庸述孔子之意，而曰：『君子而時中。』孟 子亦曰：『孔子聖之時。』夫執中之訓肇于中庸，時中之義明于孔子，乃堯、 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知時中之義，其于易也思過半矣。<sup>74</sup>

此指出《易經》所謂「中」，是指在一大成卦中的第二爻和第五爻，分居下卦與上卦之中，稱為中位。無論剛爻、柔爻，居二、五中位都可稱「中」，若剛爻居五、柔爻居二，此為當位（即陰居陰位，陽居陽位），可稱「中正」或「正中」；

---

<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sort0525/sort0526/2007/20070720143909.html>。

<sup>71</sup> 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臺灣書院實例之研究》，頁 45。

<sup>72</sup> 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臺灣書院實例之研究》，頁 65、66。

<sup>73</sup> 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32-33；收於《朱子全書》，第 6 冊。

<sup>74</sup> 見惠棟，《易漢學》，卷 7；收於氏著，《周易述》（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624-626。

處在中位的，大都是吉祥的。又《易經》觀點看，「時」以「卦」之義言之，「中」以一「爻」所適之位而言。《彖傳》又有「六位時成」之說，指占卜時看居什麼「時」，處什麼「位」，以預卜吉凶悔吝。而「故彖傳凡言中者，皆指二五」，此例甚多，如需卦：「位乎天德，以中正也。」訟卦：「利見大人，尙中正也。」履卦：「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小畜卦：「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未濟卦：「未濟，亨柔得中也。」並以之為「孔門傳授心法」。是以錢大昕(1728-1804)亦言：「故嘗謂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子思述孔子之意而作中庸，與大易相表裏。……易與中庸其理一而已矣。」<sup>75</sup>

《易經》在面對宇宙之實然的變化，將天地萬物「終則有始」與「無往不復」的循環往復現象作為時間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則，同時也觀察到「物極必反」之現象，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豐)之例，遂有「而況乎人乎」的喟嘆。又如乾上九「亢龍有悔」，《文言傳》謂為「窮之災」之厄。人面對如是事實與情況，唯如《繫辭傳》言：「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下)故以「未濟」為末卦，所謂「物不可窮也，受之以未濟終焉」。宇宙發展變化是生生不已，沒有完成窮盡之時。因此，我們面對任何事物，應置於一定的時間條件下觀察其發展變化，因時制宜，選擇一最有利的時機作為行事的標準，即是「時中」，隨時處於中道之中。<sup>76</sup>故《易經》言「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繫辭傳》言：「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下)，即要我們做好充分準備，一旦時機成熟，便堅定果敢行動，如是便會取得非凡成就。另《易經》提及三次「與時偕行」<sup>77</sup>，無論是減損抑或是增益，盈滿或虧缺，都應根據不同時機採取不同措施。所以，又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故不管是等待時機而後動，抑或是與時偕行，都應以不失時中作為基本準則。

相較於《易經》的「時中」，傳統建築則以之為基礎而強調「擇中」。古言「天子中而處」<sup>78</sup>、「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

<sup>75</sup> 見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3；收於氏著，《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39-41。

<sup>76</sup> 正是基於這點，吾人同意錢穆(1895-1990)看法，其即以「時中」概念區別儒與道之差異。見氏著，《莊老通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頁341。

<sup>77</sup> 乾《文言傳》「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損「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以及益「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sup>78</sup> 《管子·地度》：「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南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見戴望(1837-1873)，《管子校正》，頁303；收於《諸子集成》，第5冊。

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sup>79</sup>，目的是爲了便於治理。如是觀點，成爲傳統中國古代城市設計的指導原則，由大到小，由外而內，層層相應，以利國家統治。<sup>80</sup> 傳統書院建築亦延續如是思維，以講堂爲核心，此有助於教化之推展。而此便展現於仁義的立人之道上。《繫辭傳》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下)強調仁義正是儒家哲學的核心，表現於外即是「禮」。《禮記·曲禮上》言：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呈現出人間一切舉止行爲、道德彰顯，以及宗教祭祀皆範圍於「禮」的規範之中，不依之而行是無法達致完滿的。因此，人是否依「禮」成了人禽之別的根本判準。孔子所言「正名」，其意亦在此。<sup>81</sup> 因此可以說，「禮」之奉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主張。對之，《易經》自確認「天尊地卑」的地位開始，便將名分、等級絕對化了。《繫辭傳》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sup>82</sup> 《易經》思維乃是就外在自然現象比擬於人事，以八卦類比於八種自然事物，由之組合使人自省當如何處世應對，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文言傳》)，也因此《易經》哲理化了。其從天

<sup>79</sup> 《呂氏春秋·慎勢》。見高誘注，《呂氏春秋》，頁211；收於《諸子集成》，第6冊。

<sup>80</sup> 程建軍，《中國建築與周易》，頁82-83。

<sup>81</sup> 《論語·子路》：「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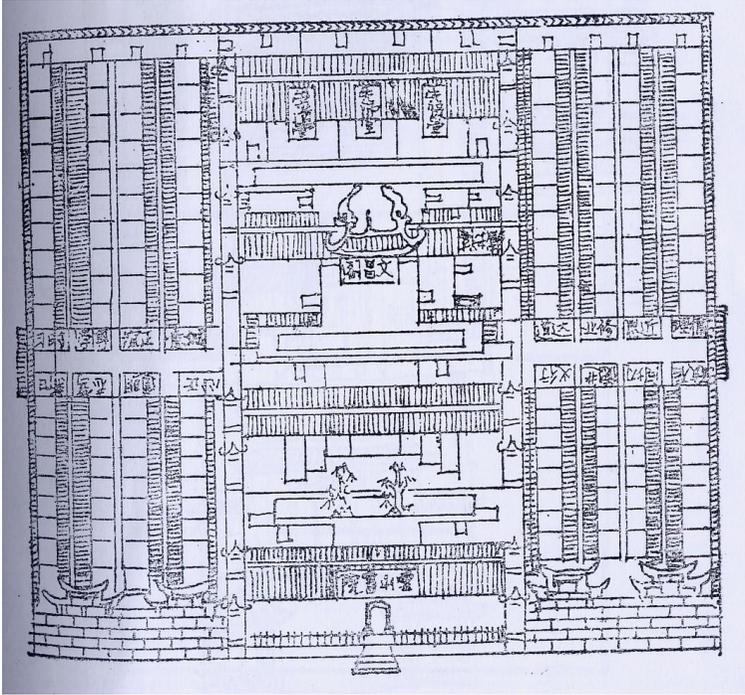
<sup>82</sup> 《禮記》中亦有以天尊地卑的意象論述「禮」之不可變異，與《繫辭傳》此段頗爲雷同。如〈樂論〉云：「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地乾坤論及夫婦，而後引出人倫之道，關懷十分明顯，即在將人倫大道建基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的自然意象之中，而「天尊地卑」是最絕對的了，因此象乾為天的君、父也就成為絕對了，人必須以之為訓，無可脫逃。<sup>83</sup> 依此，「禮」的紀綱、名分都絕對化了。然而，如是論點只能說是對於人間世界秩序之展現的一種說明。在「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思維下，一切都需以「禮」作為要求，「道德仁義」即為其內容，《禮記·仲尼燕居》曾言，「禮」是治事，如飲食、服飾、宮室、車輿、器皿之日常生活，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等之人之大倫，如朝廷、軍旅、祭祀、死喪等之禮儀制度，無非「禮」所統度。<sup>84</sup> 建築亦不例外。呈顯於傳統書院建築上，即空間「布局中的前後、高低、大小、左右圍護、嚴謹對稱、秩序井然等，正是尊卑、主次、上下等的禮制制度、等級秩序、宗法倫理的思想在建築上的反映。禮制秩序實際上成了中國古代建築體系獨特的規劃設計邏輯和依據」。<sup>85</sup> 傳統書院建築以中軸對稱，以及與多進院落式格局方式所要呈顯的蘊義，即是強調上下尊卑、內外有別、主從分明的「禮」之秩序。故愈近中軸的建築地位愈尊，如住宅之正廳、寺廟之正殿；在建築群中若屋頂高度最高，使用材料愈講究，外觀也最宏偉，即都在表現其地位的重要與崇高。兩旁的齋舍地位自然就較講堂、祠堂來得卑微了。由是可知，中軸對稱式的建築群，呈顯了《易經》「時中」的精神，自然亦呈顯了「禮」的核心蘊義。

<sup>83</sup> 司馬光(1019-1086)所論「天尊地卑」便是《繫辭傳》所指出的意象：「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制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王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見《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第一冊，頁2-3。

<sup>84</sup> 原文：「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

<sup>85</sup> 程建軍，《中國建築與周易》，頁133-134。



湖南雲山書院的嚴格對稱布局<sup>86</sup>

### （三）天人合一觀

傳統書院選址山林勝地，如是空間明顯具有某種遺世而獨立的文化堅持，亦表達了一種對世俗世界無言反抗的文化意圖，同時也表明儒家生命義理只有在祛除世俗的蕪雜、喧囂後才能感悟得到。這種選址特點，除受佛教禪林制度的影響之外，實欲求得外在世界與人文世界的和諧統一，故優美環境與幽雅意境的營造，即體現了人與建築、外在世界（自然）的協調，充分反映了傳統「天人合一」的理想。<sup>87</sup> 如是理念，強調「變動不居」與「為變所適」（《繫辭傳·下》）的《易經》是十分突顯與肯認的。《繫辭傳》言：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下）

此段話呈顯數個要點。其一，「易」包含一切。即天、地、人三才泛指世間一

<sup>86</sup> 引自楊布生、彭定國編著，《中國書院與傳統文化》，頁 168。

<sup>87</sup> 楊慎初，《中國書院文化與建築》，頁 101。

切，人居天立地之間。其二，「陰陽」（柔剛、仁義）為世界變化的原因，故言「兼三才而兩之」；對此，《說卦傳》解釋：「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因此言「六」，即是解釋卦象何以為六爻。其三，一切都在變化，此亦是《易經》哲學的核心。無論是天、地、人之「道」皆在變動，對之稱為「爻」（即卦之全體，自初至上，各有不同）；爻有類別，此稱「物」（即陰陽，指高下遠近貴賤之差）；萬事萬物相互夾雜，稱為「文」（指陰爻陽爻之相間，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則無所雜而文不見。除乾、坤二卦外皆陰陽錯雜以成文）；若夾雜不適當即存在著吉凶兆，夾雜恰當便存在吉兆（文有當否，陽居陽位當，居陰位不當；陰居陰位當，居陽位不當。當者多吉，不當者多凶）。<sup>88</sup>《易經》將「天」與「地」視為乾、坤二卦，六十四卦亦自此起。《繫辭傳》解釋：「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下）「德行」指天地運行化生萬物。乾為天下最剛健的，坤為天下最柔順的，但各自呈顯平易與簡約，亦瞭解運行必會遇到艱險（如天有大旱、暴雨等）和阻礙（如地有高山、巨川等）。因此，「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於是「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全上），即以八卦解釋世間所有的一切。簡單說，《易經》整體思維即是就宇宙之實然呈顯出人事之應然，天人於此有了一個完美的結合。乾卦《文言傳》言：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此目的在以天道貫通人事，正性命以明道德修身之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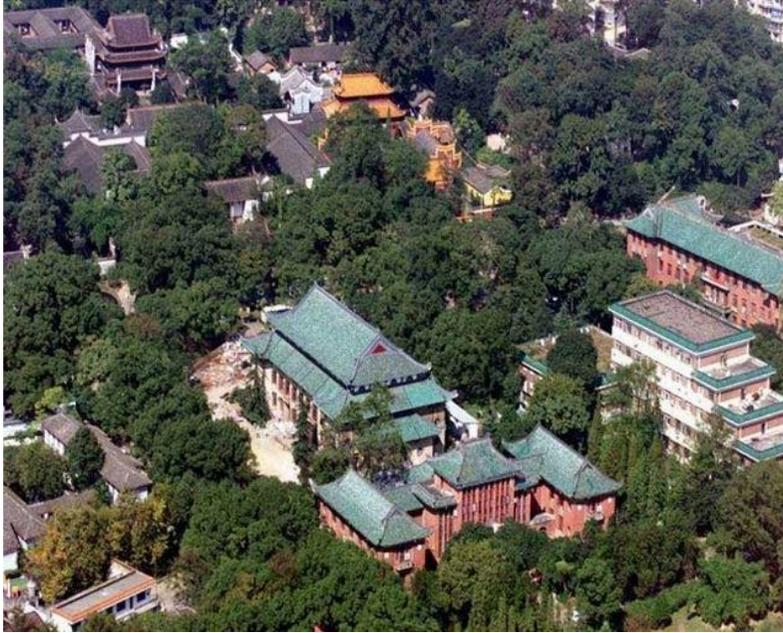
<sup>88</sup> 周振甫，《周易譯注》，頁 277-278。



湖南益陽箴言書院<sup>89</sup>

依上述《易經》天人合一思維所產生的建築空間，乃指居處環境對人之身心影響為中心，所以強調人的思想與行為當與整體世界運行、自然變化相一致，故而著重於整體格局，講究事物彼此之間的聯繫，考察物體的對稱、互補、序列之演變，效天法地，找尋天地人的自然和諧。傳統書院建築在選址與佈局上，便是依《易經》「效天法地」的原則而來，即選擇一個最佳的自然方位做為基地，以取得良善美好的建築環境，講究「前水為鏡，後山為屏」，聚氣藏風，適合講學論道、心性修養、超凡脫俗與游息居住，追求「變化氣質」，達到順天人和與天人合一之境域。此運用於建築之上，即是如何效天法地，找尋天地人的和諧與自然。

<sup>89</sup> 引自楊布生、彭定國編著，《中國書院與傳統文化》，頁 177。



嶽麓書院鳥瞰圖<sup>90</sup>

#### 四、結論

本文察考了傳統書院的建築空間，包含教學、祭祀與藏書等功能，故主要建築呈顯為講堂、祠堂、書樓等。傳統書院建築以一中軸縱貫，講堂、祠堂、書樓即位於此中軸之上，兩側齋舍以對稱形式分布左右，左尊右卑。又書院座落多是座北朝南，故以向陽為荷。中軸上愈後面的建築愈崇高。不過，書院畢竟是教育文化機構，一切仍是以教學為主，所以書院的中心在講堂。講堂設計是全面敞開，此有助於將講堂旁邊的外在世界納入講學空間。傳統書院以三進中井空間密閉格局呈現，以讓師生在此靜謐地問學求道。是以傳統書院整體建築空間呈顯了一種獨特的人文氣息。傳統書院如是設計，與《易經》涵化了的文化觀密切相關。如書院的擇地與方位，受自《易經》啟發之民間風水影響甚深，文王八卦方位即為一例。又《易經》強調伺機而動、與時俱進的「時中」精神，呈顯於書院建築的「擇中」意象，於空間呈顯上表現出「正大氣氛」，更呈顯傳統「禮」的要求與實質精神。而書院力求座落於山水之間，將人之學習與外在世界自然融合，完善「變化氣質」之目的。由是可見，傳統書院建築與《易經》文化關係之密切。

<sup>90</sup> 引自百度百科，「嶽麓書院」條，<http://baike.baidu.com/view/7288.htm>。

然如論者所言：「爲了追求幾千年來我們做不到的人權，卻又否定了幾千年

以更大的心胸來承認這兩個偉大嗎？」故呼喊著「回家吧」！<sup>91</sup> 論者又說：「目前，我們不瞭解自己文化比不瞭解西方問題還嚴重，以致留學生回來，老是『斷了線又接錯線』，自己成爲傳統的包袱。多用『進步的保留態度』吧：人爲創新進步，何必否定傳統的主體文化？」<sup>92</sup> 此是十餘年前出版的話語，至今仍值得省思。《繫辭傳》言「生生之謂易」(上)，指不斷變化是「易」的道理。孔穎達於〈易序〉中言：「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生，孚萌庶類，亭毒辟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謂之爲易，即變化之義。」<sup>93</sup> 由此可知，「易」基本意義是指有秩序、有規律的變化與創生不已而言的。傳統書院未來如何變化，值得反思。

---

<sup>91</sup> 王鎮華，《空間母語：中國建築的體驗與人文內涵》，頁 6-7。

<sup>92</sup> 王鎮華，《空間母語：中國建築的體驗與人文內涵》，頁 351。

<sup>93</sup> 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易序，頁三左。

## 【參考文獻】

### 一、古代典籍（依時代先後排序）

- 漢·班固等撰 《漢書》；收於《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第 2 冊
- 漢·高 誘注 《呂氏春秋》；收於三〇年代上海世界書局出版之《諸子集成》（上海：上海書店，1986），第 6 冊
- 晉·郭 璞 《葬書》；收於清張海鵬輯，《學津討原》（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第九集
- 北齊·顏之推 《顏氏家訓》；收於《諸子集成》，第 8 冊
- 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臺北：藍燈文化公司，1993／《十三經注疏》，重刊宋本周易注疏附校勘記）
- 《禮記正義》（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93／《十三經注疏》，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 校勘記）
- 宋·司馬光 《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 宋·歐陽修、宋祁撰 《新唐書》；收於《二十四史》，第 11-12 冊
- 宋·歐陽修 《新五代史》；收於《二十四史》，第 13 冊
- 宋·朱熹 《周易本義》；收於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 1 冊
- 《四書章句集注》；收於《朱子全書》，第 6 冊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於《朱子全書》，第 20-26 冊
- 宋·陸九淵 《象山全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7）
- 明·宋濂等撰 《元史》；收於《二十四史》，第 18 冊
- 明·王守仁著；現代·吳光、錢明等編校 《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清·張廷玉等撰 《明史》；收於《二十四史》，第 19-20 冊
- 清·惠 棟 《易漢學》；收於氏著，《周易述》（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清·永 瑆 《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 清·錢大昕《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清·全祖望著；現代·朱鑄禹集注 《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清·謝金鑾、鄭兼才纂修 《續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鄧傳安 《蠡測彙鈔》（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與周凱《內自訟齋文選》合刊）
- 清·陳培桂 《淡水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清·林 豪 《澎湖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教育碑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 二、研究著述（依姓氏筆劃排序）

- 丁綱、劉琪著 《書院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王啓宗 《臺灣的書院》(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4)  
王鎮華 《空間母語：中國建築的體驗與人文內涵》(臺北：漢藝色研文化公司，  
1995)  
——— 《書院教育與建築——臺灣書院實例之研究》(臺北：故鄉出版社，  
1996)  
朱漢民 《嶽麓書院的歷史傳統》(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96)  
李重耀 《臺閩地區第三級古蹟臺北市學海書院(現高氏宗祠)研究與修護計  
劃》(臺北：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992)  
李劍平編著 《中國古建築名詞圖解辭典》(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  
周振甫 《周易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91)  
高 亨 《周易大傳今注》(濟南：齊魯書社，2009)  
季嘯風主編 《中國書院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白1996)  
陳 碧 〈《周易》對中國「風水理論」的影響〉；刊《船山學刊》，2008  
年第3期(復總第69期)，頁65-67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陳谷嘉、鄧洪波 《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陳昭瑛 《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臺北：正中書局，2000)  
符宏仁建築師事務所《南投縣第三級古蹟登瀛書院彩繪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暨  
施工紀錄》(南投：南投縣文化局，2007)  
——— 《彰化縣第二級古蹟和美道東書院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暨施工紀錄》  
(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6)  
盛朗西 《中國書院制度》(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  
張瑞和 《維繫傳統文化命脈——員林興賢書院與吟社》(臺中：晨星出版公  
司，2009)  
曾文吉 《彰化縣第三級古蹟興賢書院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彰化：彰化縣  
文化局，2006)  
曾國恩建築師事務所 《屏東縣第三級古蹟「屏東書院」調查研究與修復計畫》  
(屏東：屏東縣政府，2002)  
程建軍 《中國建築與周易》(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楊布生、彭定國編著 《中國書院與傳統文化》(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楊慎初 《中國書院文化與建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楊慎初編《嶽麓書院建築與文化》(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

### 傳統書院建築與《易經》文化／劉振維

劉伯驥 《廣東書院制度》（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58）

劉振維 〈論清代臺灣朱子學〉；收於收於蔡方鹿主編，《書院與理學》（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2），頁 275-290

—— 〈澎湖文石書院的始末及其基本精神〉；刊《止善》，2009 年 12 月，7 期，頁 71-98

—— 〈彰化白沙書院之始末及其基本精神〉；刊《止善》，2009 年 06 月，6 期，頁 89-110

—— 〈由臺南朱文公祠二碑記論清代臺灣的教育方向〉；收於《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 159-178。

—— 〈論清代臺灣書院學規的精神及其對現代教育的啓示〉；刊《哲學與文化》，2008 年 09 月，35 卷 9 期（總號 412 期），頁 107-127

—— 〈臺南海東書院創建之始末及其基本精神〉；刊《朝陽人文社會學刊》，2008 年 06 月，6 卷 1 期，頁 279-322

—— 〈論臺北艋舺學海書院的儒學精神〉；刊《朝陽人文社會學刊》，2007 年 12 月，5 卷 2 期，頁 59-93

—— 〈彰化鹿港文開書院儒學精神之研究〉；刊《朝陽人文社會學刊》，2005 年 12 月，3 卷 2 期，頁 53-102

—— 〈宜蘭仰山書院之始末及其基本精神〉；刊《漢學研究》，2004 年 06 月，22 卷 1 期（總號 44 號），頁 253-280）

—— 〈略論乙未遺民洪棄生的民族精神——以《寄鶴齋詩話》爲例〉；刊《南台科技大學學報》，2002 年 12 月，27 期，頁 193-211

趙崇欽建築師事務所《高雄縣第三級古蹟鳳儀書院解體調查紀錄工作報告書》（高雄：高雄縣政府文化局，2008）

鄧洪波 《中國書院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

漢光建築師事務所 《南投藍田書院之研究與修護計劃》（南投：南投縣文化局，1993）

漢寶德 《文開書院、文祠、武廟之研究與修復》（臺北：境與象，1983）

樊克政 《中國書院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錢 穆 《莊老通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閻亞寧編《員林興賢書院之研究與修護計劃》（臺北：漢光建築師事務所，1990）

簡榮聰 《藍田書院建築裝飾藝術》（南投：南投藍田書院管理委員會，2009）

### 三、學位論文及其他

洪志遠 《形狀文法的意義描述系統初探——以臺灣傳統書院建築爲例》（臺中：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郭承儀 《臺灣傳統書院建築構造類型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簡聰敏 《清代書院建築配置與單元空間佈局類型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中國百科 「北京宮殿」條，

<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sort0525/sort0526/2007/20070720143909.html>

百度百科 「嶽麓書院」條，<http://baike.baidu.com/view/7288.htm>

## 筆記欄